



佛教文化与历史

苏晋仁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佛教文化与历史

苏晋仁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邱立  
封面设计：赵秀琴  
责任印制：立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教文化与历史/苏晋仁编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

ISBN 7-81056-048-4

I. 佛… I. 苏… II. 佛教-文化-研究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082 号

**佛教文化与历史**

苏晋仁 著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61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01-4000 册

---

ISBN 7-81056-048-4/K·7

定价：15.00 元

## 自序

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回忆在青年时期，最初接触到的佛典，是姚秦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其中谈到维摩诘居士患病于毗耶离城，释迦牟尼派文殊师利去问疾。见其室中空无所有，独寝一床。问讯之后，思大众当于何坐？维摩乃现神通力，从须弥灯王处借来三万二千师子座，以为座位，方丈之中亦不见小。室中又有天女出现，散花供养，落花堕地，唯附著于有分别心的同去诸大弟子之身。维摩为说不二法门，复从众香国取来甘露味饭供众。这些纳须弥于芥子，借佛饌于香积，都是前所未闻，思所不及，较之庄子的汪洋恣肆，实不可同日而语。继而研习《四阿含》，体会到原始佛教的质朴无华，切重实践。再读《法华》、《金刚》、《华严》、《起信》等经论，深觉教海无涯，理论弘博，其所以出世之切，正由于其入世之深，愿大誓弘，淳言化导，他要使“遍大地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启迪人的思维，感动人的心灵，令人眼界开扩，胸襟为之一洗。

自是，陆续撰写一些佛学研究的篇章，有关于佛典翻译历史的，有关于汉藏文化交流的，有关于中日佛教传播的。194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授《佛典翻译文选》

课程，摘录经律论三十余种，于叙录中起例发凡，作为了解佛学的桥梁。1958年为斯里兰卡主编的《佛教大百科全书》汉文部分编写词条，则偏重于史传和目录。史传中有些高僧，原是儒门收拾不住的人物，堪补正史的隐逸传；目录则于四部之外，别树一帜，独自成家。近些年来，又写了些读书札记，其中也保存了某一时期有关佛教的故实。时间亘续之长，已逾半个世纪。

现在将这些文字加以综合，分为四篇，汇集一处。正如古德所云：“雁过长空，影沉寒水”，这不过是潭水中的掠影而已。作为文字因缘，谨奉献于读者，敬希不吝指正。

苏晋仁  
于中央民族大学

# 目 录

## 自序

<b>第一部分 佛教翻译</b> .....	1
一、佛教译场的发展 .....	2
二、道安法师在佛典翻译上的贡献 .....	13
三、佛典翻译文选叙录 .....	24
四、真谛三藏之译述 .....	32
<b>第二部分 佛教传记</b> .....	65
一、佛教传记综述 .....	66
二、名僧传及名僧传抄 .....	108
三、梁高僧传 .....	134
四、续高僧传 .....	148
五、宋高僧传 .....	156
六、大明高僧传 .....	163
七、佛祖统纪 .....	166
八、大宋僧史略 .....	173
<b>第三部分 佛教目录</b> .....	179
一、佛教经籍目录综考 .....	180
二、僧祐律师出三藏记集 .....	195
三、历代三宝纪 .....	222

---

四、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 .....	235
五、珍贵的辽代逸书 .....	260
六、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	264
<b>第四部分 近代佛教史料</b> .....	<b>283</b>
一、释氏六帖 .....	284
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释家类 .....	289
三、释氏疑年录 .....	297
四、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	299
五、喻昧庵居士 .....	304
六、妙舟法师 .....	306
七、华北居士林 .....	307
八、中国佛教学院 .....	312
九、大乘佛教弘化院 .....	316
一〇、微妙声 .....	319
一一、中国佛教学院年刊 .....	324
一二、佛学月刊 .....	328
一三、同愿学报 .....	335
一四、同愿月刊 .....	344

---

四、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 .....	235
五、珍贵的辽代逸书 .....	260
六、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	264
<b>第四部分 近代佛教史料</b> .....	<b>283</b>
一、释氏六帖 .....	284
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释家类 .....	289
三、释氏疑年录 .....	297
四、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	299
五、喻昧庵居士 .....	304
六、妙舟法师 .....	306
七、华北居士林 .....	307
八、中国佛教学院 .....	312
九、大乘佛教弘化院 .....	316
一〇、微妙声 .....	319
一一、中国佛教学院年刊 .....	324
一二、佛学月刊 .....	328
一三、同愿学报 .....	335
一四、同愿月刊 .....	344



# 第一部分

## 佛 教 翻 译

## 一、佛教译场的发展

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桓帝灵帝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亘续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从译场组织的发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西晋（公元 148～316）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东晋——隋（公元 317～617）

第三阶段，极盛时期：唐——北宋（公元 618～1126）

第四阶段，衰微时期：南宋——清（公元 1127～1912）

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旧译时期；从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新译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现在配合着译经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民国以来，虽然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和其他各国文字翻译的佛教著作；但是在规模上翻译上，都很难与过去相提并论，此处便不再涉及了。

### （一）草创时期

佛教经典的传来，最初大部分是东来的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用口诵出梵文或胡语，然后再行翻译。这一方面是由于天竺的习惯注重口授，师弟辗转相传，“不承载文”；一方面也是由于书写的困难。所以东晋法显到北天竺诸国求戒律还是‘师师口传，无本可

写’；在中印度则是自行缮写梵本赍归。北凉沮渠京声往西域，也是口诵梵本东归。这种口诵出来的梵文，有两种翻译的方式：一种是先把梵文记录下来，再译为汉文；一种是口诵出来后，就由传言的人译为汉文。在早期虽有根据天竺僧人携来的梵本翻译的，但那并不是主要的形式。

这个时期是私人翻译的阶段，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到中国来，遇到了有人请他译经，他便可以从事翻译。所以随地可译，并不问条件如何，人选如何；因此直接参与译事的是有数的几个人，在组织上是很不完备的。如：

《道行般若经》：天竺菩萨竺朔佛，口授；月支菩萨支讖，传言译语；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侍者；孙和、周提立，劝助者。（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十月十八日译。

《中本起经》：昙果于迦毗罗卫国得梵本，来至雒阳，建安十二年（207）翻。康孟详，度语。

《首楞严经》：月支优婆塞支施崧，手执胡本；归慈王世子帛延，译者；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笔受。

《正法华经》：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本口宣出；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西晋）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译，九月二日讖。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

这里面仅有口授或执胡本的译主，传言译者（或名度语），笔受（道行般若经中的侍者张少安就是笔受者），参校四种人员，是实际工作者。劝助者则是出钱来供给和照料译事的人，是事务人员。

后汉三国期间口授梵文或手执梵本的译主，大都不通汉语，需要靠传言的人作通译，才能把梵文译成汉文。但是这个桥梁随时可以发生问题，如吴竺将炎译《法句经》，他“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

失,多不出者。”这恐怕是早期翻译者一般的现象。如果传言的人在了解上不能体会译主的意思,自然无从传达出译主的精神。同时笔受的人不是失之直译,便是失之意译,同样不能把译品用确切的辞句表达出来。到了西晋,有的译主,如法护之流,可以说汉话,上面的困难便减少了许多。这是译学上的一大进步,为后来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

## (二)发展时期

从东晋到隋,在译场的组织上,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少数人的、小规模翻译;而走上国家主持的、多数人的、大规模的翻译。在草创时期一个半世纪孕育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译主、译传和笔受人的语文了解上都提高了,打破了过去只通一方面语文——梵文或汉文——的阻碍,能够互相融会起来。译文也更加精炼华美,在当时骈俪风行的文体中,别树一帜,而自成风格。在由私人译场转变到国家译场的过渡中,可以用道安和鸠摩罗什作代表,来看译场演进的轨迹。

道安在长安,极力奖励译事,苻坚的秘书郎赵整,对译经也极为维护,东来的梵僧在他们主持下译出很多重要的经论:

《十诵比丘戒本》:外国道人昙摩持,口诵出;凉州沙门佛念,写梵文;道贤,译传;慧常,笔受。

《鼻奈耶律》:罽宾耶舍,诵出;鸠摩罗佛提,梵书;佛念,译传;昙景,笔受。

《鞞婆沙论》:罽宾沙门僧伽跋澄,口授;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秦言;赵整,正义;道安,对校。

《阿毗昙八犍度论》:罽宾沙门僧伽禰婆,诵出;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法和,请出,并理其指归。

《四阿含暮抄》：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译传；僧导、昙究、僧睿，笔受。

《婆须蜜论》：僧伽跋澄、难陀、僧伽禰婆，执梵本；佛念，译传；慧嵩，笔受；赵整，润色；道安、法和，对校修饰。

《增一阿含经》：外国沙门昙摩难提，口授；佛念，译传；慧嵩，笔受；道安、法和，考正；僧契、僧茂，助校漏失。

从道安、赵整主持的译场来看，工作人员增加了，分工也周密了。译《婆须蜜论》，是三位译主共同负责，译传佛念则是“洞晓方言，学兼内外”的人。此外译经还有润色、考正、对校的人，在组织上，已有后代译经院的初步规模。晋泰元十六年(391)，僧伽提婆在寻阳南山精舍译《阿毗昙心论》，有上座僧竺僧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参与译席，(江州刺史王凝之、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译场规模相当的大。)这已予后来国立译场千八百人参加译席的局面开辟了道路。

鸠摩罗什在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在西明阁逍遥园及大寺译出经论三百余部，从此大规模的译场，在封建统治者帝王的主持下便开始了。在这种译场中，不但有硕学专家兼通梵汉的译主，而且还集中了大量对教理有深刻研究有学问能文章的僧人作助手，(其中有些是对翻译有经验的僧人，如曾参加道安主持的译场的法和、僧睿、僧契、僧导、佛念，都参加在罗什译场之内。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给予罗什翻译以很优越的条件。)所以他的译品一出世，便突破了旧有译品的水平，而在宗教界、学术界里奠定了崇高的地位。

罗什于弘始五年(403)译《大品般若经》，“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姚兴)躬揽旧经，验其得失，咨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契、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睿、道恢、道标、道恒、道棕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

二十三日乃讫。”(经序)弘始八年(406)译《妙法莲华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此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言,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法华宗要序》)同年译维摩诘经,姚兴“命大将军常山公左将军安城侯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于长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覆。”(经序)从上可以看出罗什的译场规模是如何之大。(罗什译《大智度论》是五百余人共集,译《思益经》是二千余人咨悟。此外如姚秦佛陀耶舍译《四分律》,是三百余人陶练;北凉昙无讖译《优婆塞戒》,是五百余人共译;北凉浮陀跋摩译《毗婆沙》,是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胜鬘经》,是德行诸僧慧严等一百余人考音详义。)译时不但翻译,而且讲授,所以那些助手,很多就是听讲的弟子。(罗什译《法华经》,“尝指其大归,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译《思益经》,是“披释玄旨,晓大归于句下。”此外如陈真谛译《大乘唯识论》,是“行翻行讲”。译《摄大乘论》,是边翻边讲,“释义若竟,方乃著文”。)而且译场也是论场,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辩论,互相斟酌,所以“一言三覆”,“详其文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如陈月婆首那译《胜天王般若经》,在江州刺史黄法氾的厅事“开题序说无遮大会,四众云集五千余人。匡山僧果法师及远迹名德,并学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硕难纷纶,靡不涣然冰释。”就是先讲题旨、论辩后再翻译的。)对于旧有的译本,是拿来作参考的。而校勘的时间,有的竟占翻译时间一半以上。(罗什译《小品般若经》,用了八个月,校勘则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在此时期,另有二事可以注意:一是翻译根据的底本不止一个梵本。如行矩因为宋代慧简译的《药师本愿经》“文辞杂糅”,所以“思遇此经(梵本)验其纰缪”,在“开皇十七年(579)初获一本,犹恐脱语,未敢即翻。至大业十一年(615)复得二本,更相雠比,方为楷定。”这时因为中印的交通发达,通梵文的人多了,所以大家都以梵

本为定本,不像过去多以胡本(于闐本、龟兹本、月支本等)为根据了;再就是梵本传来的多了,译一书根据的不止一个底本,可以参照几个不同的语文的本子来翻译。二是隋以前一些封建帝王主持的译场,除姚秦的逍遥园外,北凉有姑臧的闲豫宫译场(沮渠牧犍请浮陀跋摩于此译《大毗婆沙论》),梁有建业的寿光殿、华林园、占云馆(武帝请僧伽婆罗于此译《阿育王经》)及宝云殿译场(武帝请真谛于此译《金光明经》),北魏有洛阳的内殿译场(宣武帝请菩提留支于此译《十地经论》),但都是临时性质。到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在洛阳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四事供承,复恒常度,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并且“供给事隆,倍逾关辅。”(关辅是指罗什在长安的译场而言)除三藏法师(达磨笈多)外,还有翻经法师(彦惊、法行、明则等)翻经学士(费长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正规的永久的国立译场。这是自罗什以来封建帝王重视译事更进一步的结果,纠正了过去因人而临时成立译场的权宜设施。这不但提高了译品的质与量,而且是政府把佛典翻译视为沟通中印文化的一件大事的表现。虽然炀帝只有十几年便灭亡了,翻经馆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大(仅译出九部经),但是却为唐代的‘新译’铺平了道路。

### (三)极盛时期

在“旧译”的基础上,又有梁、陈的真谛三藏作先声,唐代于是产生出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佛教的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他在贡献上,不但译出一千三百多卷大量的经论,而且是“新译”的创始人。

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回到长安,奉敕安置在弘福寺,一切由政府供给,并有二十一位学通内外的名僧来共同翻译。如:

《瑜伽师地论》：三藏法师玄奘，执梵文译为唐语；灵会、灵隽、智开、知仁、玄度、道卓、道观、明觉，承义笔受；玄墓，证梵语；玄应，正字；道洪、明琰、法祥、惠贵、文备、神泰、道深、详证大义。

《本地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凡十卷，道智，受旨缀文。

《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凡十卷，行友，受旨缀文。

《声闻地》初，《瑜伽种姓地》尽，《第二瑜伽处》，凡九卷，玄曠，受旨缀文。

《声闻地》《第三瑜伽处》尽，《独觉地》，凡五卷，玄忠，受旨缀文。

《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凡十六卷，靖迈，受旨缀文。

《摄决择分》凡三十卷，辩机，受旨缀文。

《摄异门分》、《摄释分》，凡四卷，处衡，受旨缀文。

《摄事分》，十六卷，明浚，受旨缀文。

银青光禄大夫许敬宗，奉诏监阅。

这部论是贞观廿一年(647)五月十五日至廿二年五月十五日译出的一百卷大著作，二十五位有学识的名僧在玄奘的主译下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玄奘自从贞观二十三年回到大慈恩寺以后，便专务翻译，每天自己规定好一定的进度，如果白天有事耽误了工作，必定连夜来补齐，到二更方才停笔。三更睡眠，五更便起来读诵梵本，用朱笔点好，预备第二天来翻译。这样亘续工作了十五年，才创造出那样伟大的成绩。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证圣元年(695)从天竺留学二十多年的义净归国，译出二百三十卷经论，在“新译”中是继玄奘而起的重要翻译家之一。如：



《成唯识宝生论》：三藏法师义净，宣释梵文并缀文正字；翻经沙门达秣磨、拔努，证梵义；翻经沙门达摩难陀、婆罗门伊舍罗，证梵本；翻经沙门惠沼、道琳、利明、道恪、胜庄、惠伞，证义；翻经沙门玄伞，证义笔受；翻经沙门智积，证义正字；翻经沙门惠积、李释迦、度颇具，读梵本；瞿昙金刚、阿顺、李输罗，证译；金紫光禄大夫匡巨源及修文馆学士三十三人，同监；金紫光禄大夫嗣虢王邕、判官刘令植，监护。

“新译”大家的记载里，可以看出这期的翻译分工更为周密；除去历代译场已有过的人选外，又增加了证梵语（即证梵本）、证梵义、证译、证大义、正字、缀文、监护、监阅（即监译）等人员。尤其《瑜伽师地论》是分由许多对教理有专门研究的人缀文，这更说明了对译文的重视。这两位中国翻译家主持译场，在梵文、汉文的理解上、译译上，比之过去，自然要更忠实更正确更优越了。

赵宋的翻译是继承唐代旧有的规模。如：

《大乘庄严宝王经》：三藏天息灾，译；法天，证梵义；施护，证梵文；清沼、常谨，笔受；法进，缀文；惠温、守密、道真、寔显、慧超、慧达、可瓌，证义；法云、智游、善祐，校勘；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润文；殿直刘素，监译。

参与译事的人员与唐代基本上是一样的。

唐太宗起初在宫中建弘法院安置玄奘。贞观二十一年，在长安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搯，金环华铺”，极富丽堂皇之致，玄奘就在其中译出许多经典。和帝神龙二年，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由义净来主译。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于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为三堂：中间是译经场所，东序是润文场所，西序是证义场所。复兴自唐贞元以来约二百年已间断的译经事业。天息灾为译主，由两街僧选义学沙门百人来详定经义。八年（983），译经院改名为传法院，仍继续翻译。日本僧人成寻在熙宁五年（1072）到宋，曾巡礼太平兴国寺的传法院，其日记中载有当时